

崔氏赋中的言志赋

李芸华^①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史赞“崔为文宗, 世禅雕龙”, 东汉安平崔氏的言志之赋可谓不枉此称。崔篆的《慰志赋》首次以“志”名篇, 辞简情深, 类似自传。他的“尚真”观念在崔骃、崔寔那里得到继承, 发展为《达旨》《答讯》中典雅平和的文章风貌, 而这又与其家族的儒学修养密切相关。受时代风气的影响, 崔氏的言志赋难免有蹈袭模拟之弊, 但其将个人情绪与政治表达相结合的行文方式, 对蔡邕的创作有一定启发。

关键词:言志赋; 崔篆; 崔骃; 崔寔

中图分类号: I22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72 (2015) 04-0006-06

很多赋家青睐的主题是“言志”。他们或通过叙述人生中的重要经历来抒发个人情绪, 或借助主客问答的行文体例以申明己志, 而无论何种方式, 政治表达都如血脉般盘根错节于整篇赋作的肌理之中。早期言志赋描写的内容, 经常被理解为个人政治情绪的表达, 其中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屈原因“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所作的《离骚》^①。到了西汉, 文士类似俳优的社会地位和处境^②, 使他们不可能像屈原那样写出有强烈个性的抒情言志之赋。于是, 他们淡化了赋作中的社会现实背景, 反复吟唱着悲凉凄怆的“士不遇”^③之歌, 含蓄地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幸和守志不阿的情怀。不过, 随着经学地位的提高, 尤其是东汉早期帝王对经学的尊奉以及经学文化优越感的日盛, 整个社会对文士的态度向接纳和礼遇转变, 他们首先是以儒生的身份参与到帝国的文治武功大业中去的。怀着有可能施

展抱负的期待, 他们真诚地歌颂汉德, 但儒者的自尊自重使他们高自标置, 四处碰壁, 这股忧愤之情在赋中表现的委婉而节制, 通常还夹杂着对所处时代不痛不痒甚至不情愿的夸赞, 而最终都归于自我的修德回天, 致命遂志。最早对言志赋进行划分的当推《文选》, 它按题材将赋分为十五类, 其中第十一类是“志”, 所选三篇分别为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立赋》以及潘岳的《闲居赋》。不过, 赋史上首次以“志”名篇的作品是《慰志赋》^④, 它的作者是两汉易代之际的崔篆。

崔篆是安平崔氏名垂文史的第一人。秦及西汉晚期之前, 黄河以北地区的文化发展较为缓慢, 除韩婴、毛萇外, 学术文章方面并未出现有重大建树的人物。而西汉末年, 涿郡安平崔氏崛起, 发展为东汉知名的文化世家, 至唐代依然保持着很高的社

① 收稿日期: 2015-04-18

作者简介: 李芸华 (1991—), 女, 陕西榆林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先唐文学。

① 严格来说, 《离骚》并不属于赋, 但在文体意识还不明晰的汉代, 它已被刘歆、班固归入“赋”类, 况且楚辞对赋的发展确实有不小的影响。我们研究汉代的文学, 亦不能忽视当时的文学观念, 故此仍把《离骚》看做广义的赋。

② 西汉宫廷文士的地位实际上与倡优类似, 司马迁曾言“文史星历, 近乎卜祝之间, 故主上所戏弄, 倡优蓄之, 流俗之所轻也”, 枚皋也有“为赋乃俳, 见视如倡, 自悔类倡”的感叹。直至西汉中后期, 赋家如王褒之流, 依旧被汉帝当作文学侍从养在身边, 并未在政治上委以重任。有可能正是对文士这种尴尬地位的反思, 使扬雄在后期得出赋乃“童子雕虫篆刻”, “壮夫不为”的结论。

③ 以“士不遇”为主题的赋作, 西汉时有董仲舒的《士不遇赋》, 东方朔的《答客难》, 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 扬雄的《解嘲》等。

④ 刘歆《遂初赋》的自述重大经历、抒发忧郁愤懑之情以及结尾的守志不渝, 同言志赋的行文布局相类似, 或许影响到其后言志赋的创作。

会声望。崔氏虽非累世公卿，但自崔朝以后，也算世代为官。崔朝是崔篆的祖父，昭帝时为幽州从事、侍御史；崔篆的父亲崔舒，曾担任过四郡太守；兄长崔发，王莽时位至大司空。崔发的显赫，对崔篆的仕宦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他临终时依然无法释怀，作《慰志赋》来表达心意，安慰自我。这篇赋无疑是崔篆的自传。

赋文首先以伊尹、傅说得遇汤和武丁，表明自己生不逢时，不能同他们一样，“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岂修德之极致兮，将天祚之攸适”^{[1]350}，既留下千载功绩垂范后世，又能使道德修养达到顶峰。接着，崔篆叙述了他为何“不遇”：

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汉氏之中微。
氛霓郁以横厉兮，羲和忽以潜晖。
六柄制于家门兮，王纲漉以陵迟。
黎、共奋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
睹嫫媿而乘衅兮，窃神器之万机^{[1]350}。

在这段引文中，作者哀怜自己的“不遇”在于命途不济，正碰上汉室中途衰微。“氛”“霓”是那时流行的“阴阳灾异说”中的两种现象，它们的出现意味着凶气和灾气的降临，这里指代王莽及其新朝势力气焰盛器。“羲和”是太阳神的母亲，也是他们的御者，象征为万民仰慕、操天下之柄的皇帝，此时却因“氛霓”气盛而收敛光辉。由于权力集于王氏一族，国家朝政逐渐毁废衰颓，崔篆用九黎乱德、共工触山、后羿与寒浞篡国夺政的典故，指责王莽窥伺帝王之位，专横骄恣，放任自用。接下来，崔篆开始叙述他人生中意义重大的仕宦经历：

嗟三事之我负兮，乃迫余以天威。
岂无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歼夷。
庶明哲之末风兮，惧《大雅》之所讥。
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维。
恨遭闭而不隐兮，违石门之高踪。
扬蛾眉于复关兮，犯孔戒之冶容。
懿氓蚩之悟梅兮，慕白驹之所从。
乃称疾而屡复兮，历三祀而见许^{[1]350-351}。

其一，被三公甄丰举荐为步兵校尉，不过他并未上任，而是“投劾归”，理由则是“伐国不问仁

人，战阵不访儒士”^{[2]1703}，觉得自身的儒者身份受到了侮辱。其二，赋文用八卦中“艮维”主东北的暗喻，表明作者曾担任过千乘太守。我们猜测，身为王莽朝大司空的崔发，“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世”^{[2]1703}，应该暗中促成了崔篆的这次提拔，甚至他们的母亲师氏被赐号“义成夫人”也与此有关。崔篆在赋文中申辩自己的出任并非舍弃节操，而是谨守《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3]445}的告诫，担心母亲受到牵连，所以不得不听任命运的安排，从此不再发奋有为。接着，他用《周易》《论语》《诗经》中的典故，道出自身无法隐居不仕、不得不违心任职的悔恨，并借《小雅·白驹》表达对贤人的追慕。

我们不知道新朝建立之初，崔篆是否萌生过对新政权的些许期望，但当王莽的失败已成定局后，与其划清界限确实成为很多人的明智之举。晚年的崔篆在回忆往事时，必定坚信自己从始至终都站在王莽政权的对立面，也愿意相信这样的记忆是真实的。不过，两段同出自于《后汉书》的记载却颇为矛盾。《崔骃传》云：“后以篆为建新大尹^①，篆不得已，乃叹曰：‘吾生无妄之世，值浇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独洁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单车到官，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遂辞归不仕。”^{[2]1704}而《孔僖传》载：“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2]2560}对此，钱大昕的解释是：“此传叙述家世，词多溢美，盖由东观诸臣阿其所好，蔚宗承其旧文，不加芟削，未为有识也。《东观记·儒林传》有崔篆，乃元喜初增入，其时崔寔为史官，即篆元孙也。”^{[4]599}可是，崔篆在赋文中的自陈，无非是要表明：出任千乘太守实非己意，虽于尽忠之理不合，但于尽孝之情可谅。况且晚年的他，无时无刻不感到悔恨、愧疚与不安。

归隐后的崔篆潜心于“六经”之中，探寻宇宙间最为精微深奥的道理。但随着后汉刘秀政权的建立，出任千乘太守这件事，无疑成为他人人生中一个抹不掉的污点。在随后的篇章里，他用热情的语

① 王莽改千乘郡为建新郡，改太守为大尹。

言歌颂新王朝的建立:

皇再命而绍邈兮,乃云眷乎建武。

运橈枪以电埽兮,清六合之土宇。

圣德滂以横被兮,黎庶恺以鼓舞^{[1]351}。

同明、章、和时期的典丽颂美之辞相比,这些句子显得质朴、诚恳多了,崔篆必定也将其视为后汉建立之初实际情势的写照。建武初,幽州刺史举荐崔篆为贤良,但他“自以宗门受莽伪宠,惭愧汉朝,遂辞归不仕”^{[2]1705},这在他的赋中也有体现:“辟四门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举。分画定而计决兮,岂云贲乎鄙者。”^{[1]351}与以前贤人的矢志不遇之赋不同,崔篆并没有无休止地抱怨悲叹自己的处境,而是尽力用一种毫无忧虑的姿态接受他的遭遇。他这样叙述自己的晚年:

遂悬车以縶马兮,绝时俗之进取。

叹暮春之成服兮,阖衡门以埽轨。

聊优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尽齿。

贵启体之归全兮,庶不忝乎先子^{[1]351}。

明显可以看出,崔篆是用儒家的信条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他虽然以知命作为解脱,但这并非道家的隐逸思想,而是出于对儒士名节的维护。再者,守性尽齿,启体归全,不也是不辱没祖先吗?尽管崔篆在自画像中摆出一副闲暇自得的超脱姿态,但出任千乘太守这件事是他到死都跨不过的坎儿,要不然他何必孜孜执念于申辩呢?钱大昕所云“崔宗仕莽显贵,篆亦至二千石,已昧守贞之谊。汉室中兴,正当匡时以盖前愆,乃更辞归不仕,去就慎到如此,而云无忝先子,何颜之厚乎”^{[4]599},未免过于苛刻。《慰志赋》中的作者形象,无疑是经过崔篆修正的理想中的自我。况且崔篆既不讳言仕莽,汉室中兴后又谢绝贤良之举,辞归不仕,可知其并非汨于荣名利禄之人。而与崔篆同时的陈咸,既将仕莽之事引为深讳,又在后汉朝廷继续任职,后世却沿之为美谈。相比之下,崔篆不是更为真实吗?诚如陆机“简而有情”^{[5]15}之评,崔篆的《慰志赋》情志真切平和而不做作,并非刘熙载所言“必题是志而后其赋为言志,则志或几乎息矣”^{[6]97}。

崔篆的“尚真”观念在其孙崔骃的《达旨》中得到了延续。史载崔骃“博学有伟才”^{[2]1708},十三岁已通《诗》《易》《春秋》及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大概十五岁左右,他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读书,并因潜心典籍、善于作文而与班固、傅毅同时其名。十多年后,留滞太学的他仍不遑仕进之事,故为当时人所讥讽。于是,崔骃作《达旨》以表明自己的志向^①。《艺文类聚》卷二五所录是文开首有一段作者的小序:“往者扬雄设言,客有难玄之尚白,应以战国之士,若范、蔡、邹衍,垂囊相倾,狂曜诸侯,以干浊世之宠,或人亦有睹我之澹泊,故比方昔问以难余,余略依前训以报焉。”^{[7]459}往昔扬雄因重视学问甚于为官而为人所讥笑,今者崔骃遭逢类似的处境,他的赋篇中有一些句子像是从扬雄的《解嘲》中衍化而来,从这一点来看,他写作《达旨》一定受过《解嘲》的启发^②。不过,据华峤《后汉书》记载:“骃讥扬雄,以为范、蔡、邹衍之徒,乘衅相倾,诳曜诸侯者也,而云‘彼我异时’。又曰窃贵卓氏,割炙细君,斯盖士之贲行,而云‘不能与此数公者同’,以为失类而改之也。”^{[2]1709}就赋文的立意来说,崔骃并不承认他对扬雄有所继承。

与对问类赋通常采用的形式相同,赋的作者先借“客”之口表明对“主”的行为的不理解,这种不理解在盛赞“主”之后才表达出来,从而造成一种期望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不过,无论“客”是称赞还是贬损,都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了“主”的行为。这里,“主”即作者本人。比如在《达旨》中,“客”先是极力称赞“主”熟读经籍,议论宏深,胸怀治道之术,求索幽远玄妙之境。紧接着指出“主”既不与朝廷结党连派,也不对庶人轻慢不敬,而是特立独行,与道德、先贤为师为友的错误行为。最后,对“主”怀抱才能却久未做官而感到疑惑。

今子搢屣《六经》,服膺道术,历世而游,高谈有日,俯钩深于重渊,仰探远乎九

① 关于崔骃入太学、作《达旨》的时间,见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中的相关考证,姑不赘述。

② 就行文文体而言,《达旨》为客主问答之作,其旨趣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类似。此类赋虽章摹句写,规仿甚切,但其目的与《慰志赋》一样,亦发愤表志以抒作者之怀,故本文将《达旨》、《答讯》均视为言志之赋。

乾，穷至蹟于幽微，测潜隐之无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门，进不党以赞己，退不黜于庸人。独师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与士不群。……胡为嘿嘿而久沉滞也？^{[1]443}

针对“客”的质询，“主”以坚持自己的原则为由进行辩解：“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1]444}他先历数天地初创、帝纪始制之后，从神农氏、炎帝、帝啻至夏、商、周三代以来，社会风尚由坚持道义向“通变”发展，并用无泽、许由、巢父、伯成子高、鲍焦、接舆、柳下惠、伊尹、傅说、吕尚取舍不同、各有所尚的故事，说明“道无常稽，与时张弛。失仁为非，得义为是。君子通变，各审所履”^{[1]444}的道理。接着，“主”以皋陶陈谋、张良献策、陈平解围为例，道出自己出仕与否取决于“急时”和“公心”：

与其有事，则褰裳濡足，冠挂不顾。

人溺不拯，则非仁也。

当其无事，则蠲纆整襟，规矩其步。

德让不修，则非忠也。

是以险则救俗，平则守礼，举以公心，不私其体^{[1]444}。

在随后的篇章里，“主”用热情的笔调描绘他所处的时代是“朴以皇质，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为仁”^{[1]444}，“家家有以乐和，人人有以自优”^{[1]445}，在这种统一安定的环境中，英雄、贤士与普通百姓的差异就被抹杀了。况且“方斯之际，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1]445}，自己谨守“用之则行，舍之则藏”^{[8]67}的训诫，出处进退都以“道”为准则。他认为以柔顺取媚于人而获得提拔的行为是可耻的，以自我吹嘘、卖弄才智求得禄位亦是不明智的选择，而为己谋求私利，趋时劳作，以利益为准去结交朋友，更是他所不屑的。在赋的结尾，他用一种毫无忧虑的平静心态展开“自白”：

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
臧否在予，唯世所议。

固将因天质之自然，诵上哲之高训；

咏太平之清风，行天下之至顺。

惧吾躬之秽德，勤百亩之不耘。

繁余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1]445}。

当然，以上文句不仅是“主”对自我的评价，也是崔骃个人情志的真实表达：不遗余力地提高道德修养，净化自己心灵的污秽，在安静自足中等待生命本质的呈现。为此，他略显激动地连用十六则典故，以孔子、晏婴、曹刿、卞严、范蠡、伍子胥、鲁仲连、申包胥、唐且、甘罗、赵衰、赵盾、季札、柳下惠、颜回、程婴的事迹为例，表达自己愿意承续先贤德行与事业的决心。

《达旨》不仅文辞华美，句式整赡，而且出现了集束式的征事用典^①故刘勰评其为“吐典言之裁”^{[9]96}。《达旨》清楚地表现出从东汉前期开始，作为本时代主要文学样式的“赋”，其写作已不可避免地“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9]234}，甚至因经学的影响而“自托于先圣之经典，结心于夫子之遗训”^{[10]7}，从而极大地弱化了个人情绪表达的具体化。与《慰志赋》的自传性相比，《达旨》叙述的只是人生某一阶段的精神状态。自章帝元和元年（84年）始，崔骃作品中颂美明君贤臣、彰显文治武功的成分大为增加，已透露出仕进之意，而在太学的最后几年，崔骃颇为困乏，与《达旨》中不遑仕进、澹泊无求的形象已不相符^②。不过，能追随初心二十多年之久，想必他在写作《达旨》时，必定将之视为个人情志的真实表达。这一点，在其孙崔寔的《答讥》中得到了继承。

与《达旨》类似，《答讥》通过对非议出世者进行回答，并对入世者提出非议，来表明作者的志向所在。与父辈相比，崔寔的仕宦经历较为丰富。他做过两任侍郎，第一次迁大将军梁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人著作于东观；第二次与诸儒博士共同

① 西汉晚期的文章就已出现大量引用典故的现象，故刘勰有“自卿、渊以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之后，颇引书以助文”之论，见其《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页。

② 崔骃于章帝章和二年（88年）为窦宪掾属，方始离开太学，是年五十九岁。相关考证见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

商定《五经》。其间,他还担任过五原太守。梁冀被杀后,崔寔因故吏免官,禁锢数年。鲜卑边犯起,他被司空黄琼举荐为辽东太守。终召拜尚书,可崔寔因世方阻乱,称病不视事,数月免归。《答讥》出于何时已难考证,但据文意可知,当为崔寔出世后所作无疑。而“纤芒豪末,祸亟于外。荣速激电,辱必弥世”^{[1]845}之叹,想必是作者经历过宦海浮沉之后,才得出如此深刻的结论。在《答讥》中,“客”以百里奚、管仲、宁戚、吕尚致仕的典故,说明享天爵之誉的人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仕朝廷,辅佐皇帝,拯民济世,而非隐藏学识,坚持操守,毫不动摇平素出世的志向。

今子游精太清, 潜思九玄,
厉节縹霄, 抗志浮云。
口愿甘而尝苦, 身乐逸而长勤,
志求贵而永卑, 情好富而困贫,
慕容名而失厚, 思虑劳乎形神^{[1]844}。

最后六句看似是“客”对出世者得不到“甘”“逸”“贵”“富”“名”而感到惋惜,实则巧妙地讽刺了人世者的本心。崔寔并非汲汲于功名利禄之人,史载他曾多次谢绝三公的举荐:“父卒,隐居墓侧。服竟,三公并辟,皆不就。……后辟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2]1725}他把贫贱富贵看得很淡,在隆重置办完父亲的丧礼后,“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2]1731}。因此,他以“子徒休彼绣衣,不知嘉遁之独肥也”^{[1]845}驳斥了“客”的非议,认为合乎正道的退隐才是最惬意的选择。在随后的篇章中,崔寔举了李斯、伍子胥和文种的例子,他们虽然辅佐君王成就了一番大业,终究免不了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况且这些想要拼命跻身于名利场的人们:

不揣已而干禄, 不揆时而要会。
或遭否而不遇, 或智小而谋大。
纤芒毫末, 祸亟无外。
荣速激电, 辱必弥世^{[1]845}。

能力与地位的不匹配已司空见惯,即使能够获

得荣名利禄,遭到的耻辱也将终及一生乃至家世。和他的祖父不同,崔寔的志向并非济世、俟命,而是归隐以避祸全身:

守恬履静, 澹尔无求,
沉缙濬壑, 栖息高丘,
虽无炎炎之乐, 亦无灼灼之忧。
余窃嘉兹, 庶遵厥猷^{[1]845}。

崔寔少好典籍,明于政体,早年的他对于仕进并没有这么悲观。那个时候,他作为一名实干官员,不仅能教民纺织,发展经济,还能整厉军队,抵御边寇。他所作的《政论》切中时弊,旨在理乱,文风虽显激切峻急,但皆源于其救弊补缺之心,故仲长统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2]1725}。但是,随着东汉后期政治情况的恶化,崔寔想要逃离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于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8]161}的思想占了上风,他所追寻的“道”转变为彻底的归隐。

崔氏的言志赋都是个人情绪的表达,只和政治有间接的关系。随着东汉政权由强盛走向衰微,崔氏赋中对所处时代政治教化的颂美之声逐渐匿迹。而在表达个人情绪方面,这些篇章和扬雄的《逐贫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十分相似,但更为典雅平和。同东汉文章的总体风貌相一致,崔氏的言志赋也有“无一文不以经术”^{[11]134}的特点,这与他们世代习经的家学门风有关,表现在具体的篇章中则是大量的征事用典。此外,受经学家法、师法的影响,崔氏的文学创作重陈规而少创新,甚至有模拟蹈袭之弊,譬如崔骃的《达旨》和崔寔的《答讥》,就被洪迈指责“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屋下架屋,章摹句写”^{[12]88}。不过,崔氏一门累叶文才,雅好创作,自崔篆至崔寔,“挾藻摘秀,并擅才美,为儒林文宗。蔡邕继之,益加隽伟。于是东京之文,比隆西汉”^{[13]870},可见其在文章上的成就斐然可观,并因此影响到东汉末年最为著名的文人蔡邕。而蔡邕的出现,为东汉文坛带来了一股新的风气,言志赋中的个人情感表达与政治评论,遂被极佳地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 [1] 费振刚, 仇仲谦, 刘南平, 校注. 全汉赋校注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5.
- [2] [南朝宋] 范晔. 后汉书 [M]. 李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3] 周振甫. 诗经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4] [清] 王先谦. 后汉书集解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5] [西晋] 陆机. 陆机集 [M]. 金涛生,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6] [清] 刘熙载. 艺概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7] [唐] 欧阳询. 艺文类聚 [M]. 汪绍楹, 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8]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9] [南朝梁] 刘勰. 文心雕龙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10] [东汉] 王符. 潜夫论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11] 陈柱. 中国散文史 [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4.
- [12] [宋] 洪迈. 容斋随笔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13] [元] 郝经. 二十五别史·续后汉书 [M]. 黎传纪, 易平, 点校. 济南: 齐鲁书社, 2000.
- [14] 陆侃如. 中古文学系年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 [15] 刘跃进. 秦汉文学编年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16] 康达维. 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 康达维自选集 [M]. 苏瑞隆,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责任编辑: 王 芳)

Lyric *Fu* Written by Cui's Family Member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LI Yun - hu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Cui's lyric *Fu* could compete for the praise given by historians that Cui's family could be regarded as literary leader for the future generations. Among Cui's family members, Cui Zhuan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use "ambition" as the title and his article is brief but deeply expressive, which is similar to autobiography. His proposal regarding advocating truthfulness was inherited by Cui Yin and Cui Shi, then it was developed as a kind of elegant and peaceful article style, reflecting in two articles *Da Zhi* (达旨) and *Da Ji* (答讥). Furthermore, this natural writing style is in turn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family's Confucianism cultivation. Although it was inevitable for Cui's lyric *Fu* to follow or imitate previous articles due to historical influences, it gave certain inspiration to Cai Yong's creation because of its article style that blended personal feelings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s in their works.

Key words: lyric *Fu*; Cui Zhuan; Cui Yin; Cui Shi